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爱国思想浅析

苏中立 涂光久

当历史刚跨入二十世纪之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曾写了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预言二十世纪的新世界，中华民族必将“雄飞宇内”。这首诗歌和他在戊戌变法前后写的一系列爱国诗文，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救危立国的伟大抱负和高尚情操。今天，批判地继承这一爱国思想的宝贵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爱国相砥砺”

梁启超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不能离开家族、家乡、国家而生存，而个人与家族、家乡以至国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爱己与爱家、家乡、爱国也是一致的，“爱乡之心，扩而大之，即爱我国。”^①他特别强调“国家即我命根，”^②真爱国者应该“舍身救国”^③，这种牺牲自己以救国家、牺牲个人以利同胞、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神圣感情，是和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④这一特征相联系的。在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总是要在“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各种不同的斗争，他们“不能对自己为之进行斗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条件采取无所谓的不关心的态度，因而，他们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⑤。戊戌变法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阶段，是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正象列宁评价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者和十九世纪俄国启蒙者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⑥，从而为这种“共同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息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由于梁启超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命根，时刻注视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当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于是和维新志士们一起“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年方二十二岁的梁启超，就目睹亡国危险，呼吁清廷抗战，当西太后集团对他这样人微言轻的小小举人的呼喊置若罔闻时，他悲愤填膺，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⑧这首词慷慨悲歌，充满爱国者的血和

泪。随后，他作为康有为主手和主要助手，积极发动《公车上书》，参与组织强学会，主编《时务报》，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参与发起南学会，协助出版《湘报》，建立保国会，积极宣传变法维新，大声疾呼救亡图存，成为立志维新热血沸腾的爱国者。“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⑩。到日本后，又立即创办《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⑪，继续变法维新事业。

中日甲午战后的形势，正象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爱国论》中所说：“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而海外侨胞，倍受蹂躏，尤其是被掠卖的华工，“所受凌虐，甚于黑奴，殆若牛马，惨酷之形，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海外侨胞“未有不痛心疾首，愤发蹈厉”，而想报仇雪耻的。^⑫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爱国问题是伴随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中国人民因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迫，就起来谋保国之策，投入爱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之一。梁启超看到甲午战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而引起的严重民族危机和瓜分危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促使人们认识爱国保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当时条件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但“其爱国之性质，隐而未发”，其原因，一是“政府压制民权”，二是“民不求自伸其权”。因此，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兴民权，育新民。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⑬他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谈国家、国政和爱国，当然是非科学的、错误的，但他把爱国与民权联系起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就使爱国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新的阶级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更替了，国家的阶级内容也就改变了。讲爱国，首先碰到一个问题：爱那个阶级的国家，不管自觉与否、明确与否，人们总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戊戌变法时期，瓜分危机迫在眉睫，梁启超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提出“救危立国”的具体方案。他们认为，危之源在守旧，救之方在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⑮就是说，变法要先变人，而改变官制，即“抑君权，兴民权”，变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变法维新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⑯。因此，只有兴民权，才能使国民知道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知道爱国，并团结起来同别的国家去竞争，“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⑰。这种要求兴民权、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在当时条件下具有鲜明的

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特别是他处于当时维新与守旧斗争最激烈的湖南地区，接触了一些赞助变法维新的地方官吏和青年爱国学生，把民权宣传与维新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

戊戌变法后一个时期，梁启超更加激烈地要求兴民权。他于1898年11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的“独一无二之宗旨”，即是“倡民权”，“百变而不离其宗。”^⑮在1901年写的《自励》诗中，更表达了他“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闢新知”的雄心壮志^⑯。他极力从中外历史上寻找“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的根据。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就知道爱国，故“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中国则不然，“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以国为一人之私产”，奴隶没有任何权利，“不以国为己之国，人人不知其有国”，“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民也。”他还从资产阶级国家观出发，指出：“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并据此向清朝统治者提出“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要求，反对“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的君主专制制度^⑰。这种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国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正是“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的基本内核所在。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热情鼓吹者，曾以他的民权爱国思想和行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梁启超还认为，欲兴民权，必有新民。在他看来，“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而“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⑱他特别痛恨自己民族处于封建淫威下的“奴隶根性”，甚至把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入侵，都归之于中国人民具有奴隶根性，说什么“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⑲他在1902年写的《新民说》一文中，强调“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新民，才能内建君主立宪之“新国家、新政府、新制度”，使国家“安富尊荣”，外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在新民的品格中，他特别强调新民要树立国家思想，只有“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严中国与外国之别”、“政府与国家之别”，才能“由鄙民而进为国民”，发扬爱国精神，“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才能去掉奴隶根性，以与西欧各国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⑳这里，他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愚昧落后，说成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愚昧落后造成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国家的落后，进而导致帝国主义的入侵，显然是错误的，对广大群众中蕴育的伟大力量和聪明才智也缺乏认识，高谈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但他要求培养去奴隶根性而具有资产阶级品格的新民的思想，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时曾经说过，“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所以“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说俄罗斯民

族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不但没有谴责，反而加以赞扬，说他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②4}。梁启超的“新民”说，同样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表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和“国民”等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美哉我国，伟大哉我国民”

梁启超在祖国极端贫穷落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日子里，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意志消沉，没有低首屈服，而是以高昂的爱国热忱，赞颂伟大祖国和伟大国民，并对祖国的美好前途充满着自信。

他在1902年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在叙述祖国之地理、人口、语言文字、古书等为“世界莫能及”之后说：“美哉我国，伟大哉我国民！”他相信如此“伟大国民”，一定能恢复祖国“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他说：“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生于此国，为此民，……歌之舞之，发扬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②5}1903年写的四则《爱国歌》，每则结尾重复吟唱：“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这首爱国诗歌，不仅直接倾吐了他热爱祖国、热爱国民的深厚情谊，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着自信力。在他看来，英国和日本“区区三岛尚崛起”，而我中华兴盛强大更是毫无疑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阻碍我国的文明进步，只能是痴心妄想^{②6}。

梁启超还写了一些诗文，表达了他对祖国美好前途的向往和追求。他在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赞美“少年中国”象“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号召中国少年努力从事于改造中国的战斗，使少年中国尽快在战火中诞生，巍然屹立于世界之上^{②7}。1903年写的《说希望》一文，更是热情奔放地高歌中国“美哉前途，郁郁葱葱”之新希望^{②8}。

梁启超的爱国爱民之心与忧国忧民之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②9}。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失败的危急形势下，这种忧国爱国的思想，尤显得难能可贵。

四、反对“故见自封”和“妄自菲薄”

梁启超热爱祖国，并不排斥学习外国。他认为有一种爱国论是不健全之爱国论，应该防止和克服。这种不健全之爱国论认为：我国为文明最古之国，我民为德性最美之民，西方学术不逮我，西方技术采之易，西方礼教风俗无足取，吾但保存吾国粹而发挥

之，斯足为治矣。梁启超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它虽然在“鼓励国民自重之心”方面，有时“亦薄收其效”；但在“长国民故见自封之习，而窒其虚受进取之心”方面的消极作用却是很大的，两相比较，“功远不足以偿其罪”，它“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者”。^⑳这种分析是很中肯的。

梁启超本人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故见自封”的。当他十八岁那年（1890年）开始由归学转向新学之后，就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认为，“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㉑他所说的“取人长以补我短”，不仅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而且要仿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强权以议院为本，”^㉒这既是他提出的“改变官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内容。

梁启超在力主学习西方时，有时也震惧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中国一切均不如人；但他对我国固有的民族传统并未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曾正确地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㉓他憎恨那些“视欧洲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可耻之徒。他还以外国特别之风俗为例，既说明外国风俗的确有“可取为师资”的东西，同时又指出，“却有很多是不必效法、不能效法、不可效法”的，特别是西方“近日社会之堕落，当引以为戒者抑亦不少。”^㉔因此，对外国的东西，应该取其所长，舍其所短，不应该全盘接收，更不应该崇洋媚外，失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民族之奴隶性”^㉕，二者同样有害。他特别强调，各民族“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中国文明发达之早，诚足以自豪于世界”^㉖。这些思想都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民族自豪的情感为每个民族所固有，因为“每一民族，不论是大民族或者小民族，都有其属于该民族的、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质量上的特点与特征”，即“每一民族提供给世界文化总宝库、补充这总宝库、丰富这总宝库的贡献。”^㉗在民族自豪感中，存在着对自己优秀的民族传统的热爱，它是结合着本民族对于全世界历史所提供的贡献的自豪，这种民族自豪与承认其它民族的贡献长处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不尊重其它民族，就不可能尊重自己民族；反之，如果轻视自己民族，就不能以尊重态度对待其它民族。梁启超在爱国问题上，既反对固步自封，又反对妄自尊大、崇洋媚外的思想和态度应该说是正确的，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

五、“史学是爱国心之源泉”

梁启超认为，“爱国者，欲国之强也”，而国强“必以教育为起点”，只有从教育入手，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开民智”，才能“伸民权”，使中国转弱为强，达到救国的目的。如果不办教育，就不能培养人才，就是“空言爱国，无教于国。”^㉘在国民教育中，他认为历史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而历史教育中，“本国史一科”，更是“刻不容缓”^㉙，学习本国历史，最容易“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㉚。但是，他又认

为，中国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是“帝王将相之家谱”，少数人之“墓志铭”，读者读完全部旧史书，也难以给人作“资鉴”，难以激励其“爱国之心”。所以史学必须革命，“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④①}只有通过史学革命建立起新史学，才能“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④②}，才能使史学由“帝王将相资治通鉴”变成“国民资治通鉴”，才能“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④③}很明显，梁启超夸大了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的作用，完全否定封建史学的意义也欠全面；但他主张用资产阶级新史学代替封建主义旧史学，新史学应该而且可以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作“资鉴”，是应该给予肯定的，特别是中国近代新史学，一开始就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而出现的。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决定服务于这种政治斗争的资产阶级史学，充满着战斗的锐气，具有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武器。

梁启超还从多方面具体阐述了历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巨大作用。第一、通过历史地理的教育，可以使人们了解祖国地大物博、山河壮丽，从而增强热爱“美哉中国之山河”^{④④}的思想感情，并由此而感到自豪。第二、通过历史人物的教育，可以直接触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既可以由于祖国历史上许多爱国志士的光辉业绩而感到自豪，并决心学习“我先民之远志”，^{④⑤}以图国家之富强；也可以效法外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者的“所志所事”，使我国象资本主义强国那样“能巍然立于世界上”；甚至可以以历史上爱国者的形象自比，“彼愤焉吾愤，彼喜焉吾喜，彼忧焉吾忧，彼病焉吾病”^{④⑥}，字里行间，渗透着爱国者的满腔血泪。第三、通过历史事件的教育，特别是通过对重大事件的纪念会、庆祝会，可以使人们“忽起历史上无限之感情，响往先民，而益以增长其强固勇猛进步自立之气”，达到“记已往，振现在，厉将来”^{④⑦}的目的。第四、通过历史文化的教育，更能激起人们的自豪感和爱国心，特别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真可自豪者也。”^{④⑧}

梁启超还主张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教育。比如，讲“爱国之故事”，诵“爱国之诗歌”，传“爱国之真理”，行“爱国之实业”，佩“爱国章”，组“爱国社”，开“爱国会”，连儿童“所玩之物”，也“以爱国为纪念”^{④⑨}。从儿童、少年到壮年、老年，都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进行爱国教育。

总之，梁启超把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启蒙教育结合起来，为了一个目标：争取国家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赶上并超过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鲜明的爱国思想，不仅在戊戌变法前后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就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也应该给予适当的肯定。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其爱国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彻底的、局限的、狭隘的性质”^{⑤⑩}。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爱国思想中的精华，并从他的局限性中引出必要的教训，作为今日之借鉴。

- ① 《乡土观念与地方观念》，《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二，第14页。
- ② 《何故爱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二，第3页。
-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7页。
-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
- ⑤ 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阀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68—169页。
- ⑥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28页。
- ⑦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一，第303页。
- ⑧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文集之四十五（下），第83页。
- ⑨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
- ⑩ 《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文集之四十五（下），第2页。
- ⑪ 《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文集之三，第30页。
- ⑫⑬⑭⑮⑯⑰⑱ 《爱国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二，第2、66、67、75、76、73、69、68、72页。
- ⑲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86页。
- ⑳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第10页。
- ㉑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第128页。
- ㉒ 《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丛刊），二，第548—550页。
- ㉓ 《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词》，《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文集之六，第54页。
- ㉔ 《自励二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文集之四十五（下），第16页。
- ㉕ 梁启超书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㉖①② 《新民说》，《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第1—8、20—26页。
- ㉗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10—611页。
- ㉘③ 《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八，第2、3—4页。
- ㉙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文集之四十五（下），第21—22页。
- ㉚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文集之五，第7—12页。
- ㉛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文集之十四，第18—22页。
- ㉜④ 《忧国与爱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专集之二，第39—40页。
- ㉝ 《不健全之爱国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二，第18页。
- ㉞ 《古议院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第86页。
- ㉟⑤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文集之六，第3、1页。
- ㊱ 《斯大林关于与荷兰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时的讲话》，《布尔什维克》杂志，1948年第七期第2页。
- ㊲⑥⑦ 《新史学》，《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一，第1、9、8、4页。
- ㊳⑧ 《东籍月旦·历史》，《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九，第21页。
- ㊴⑨ 《中国地理大势论》，《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二，第1页。
- ㊵⑩ 《张博望班定远传》，《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四，第34—35页。
- ㊶⑪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三，第71—72页。
- ㊷⑫ 《敬告我国民》，《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三，第50页。
- ㊸ 列宁：《社会主义和农民》，《列宁全集》，第九卷，第293页。